驿传卡伦

清代驿传体系的近代转型

刘文鹏

［**摘要**］清代驿传体系曾以快捷、高效为特征为整个帝国的运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到清代后期，在骚扰、侵贪等因素的影响下，驿传体系表现为迟滞、效率低下。在西方近代化的通讯、通信方式传入中国后，传统驿传体系固有的发展模式被打破，驿传体系的功能最终被近代化的交通、电报、邮政所取代。

［**关键词**］驿传体系　功能　近代邮政　电报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8587（2003）- 03 - 0058 - 09

The Modern Change of Post Road System of Qing Government

The Post Road system of Qing Government had provided energetic support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whole imperial and was famous for its swift and effective character. However, in Later Qing Period, being influenced by molest, taking bribes and other elements, the post road system appeared sluggish and low effective. After western modern communication method being transformed into China, the innate development mode of Post Road System was broken down, its function finally being replaced by modern transport, telegraphy and postal service.

近年来，有关清代驿传体系近代转化的文章多认为：清代（古代）邮政的转化方向是近代邮政。从常识来看，这一观点似乎无可挑剔，但仔细推敲，会发现其中颇有值得斟酌和商榷之处。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古代邮政与近代邮政的关系如何。这里所说的“清代邮政”按清会典的解释，驿站、塘、铺等都属邮政之列，实际是指驿传体系；这里所说的近代邮政是指借鉴西方的邮政模式发展而来通信体系。同有“邮政”之名，两者的含义却有重大区别，其区别表现在体系结构和功能上。所以，要弄清两者前后相继的关系到底如何，需要从清代驿传体系的构成和功能谈起。郑观应所言：“盖电报设而驿差轻其半，轮船通而驿差轻其七八，若铁路之干枝渐次告成，而驿传势难再留。”①可见，驿传体系的近代转型是按照功能向几个不同方向发展的，本文将主要讨论作为信息传递工具的驿传体系在近代的发展方向。

一

清代的驿传体系，是指清代以驿站为主的信息传递方式的总和，包括驿、台、站、塘、铺等信息传递设施和方式。它们以京师为中心，遍布各省以及将军、都统、大臣辖地。

驿站是清代驿传体系的主干，包括驿、台、站。驿是对行省区驿传设置的称呼；台、站则指在边疆地区的驿传设置。在清代以前，驿与站二字是分开用的，汉族政权多用驿，如明代称之为水马驿；少数民族政权多用站字，如元代之站赤。清代的会典中仍然有对驿与站

［**收稿日期**］2002 - 4 - 15

［**作者简介**］刘文鹏（1972 —），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博士；北京 100872

的区分，“各省腹地所设为驿，盛京所设亦为驿。”[②]台、站大多位于东北、蒙古、新疆或青藏等边疆地区。但在实际政治、军事生活中，驿、站二字一起使用的情况已经极为普遍。驿站所递文报是中央和各省省级官员[③]或省级官员之间有严格时间限制的文报，主要包括廷寄、紧要奏折、题本。[④]

铺，又称急递铺，靠人力步行接递各级官府的日常公文，密布于各省的府厅州县之间。铺是专门的文报递送系统，负责传递中央各部院与各省以及各省府州县之间的日常公文，一般不承担官员接待、物资转运的任务。[⑤]各省在京城都设有驻京提塘，其职责之一就是收发中央与各省之间由铺递送的寻常公文。[⑥]铺的间距一般为 15 里，每铺设铺司一名，铺兵四名，由国家发给工食银。文报到铺后，由铺司登记，再由铺兵步行递至下铺。铺递系统的费用与驿站一起，由各省向中央奏销。

塘在清代是一个有多种含义的词语。会典的解释是，塘设在西北安西、哈密、镇西一带，西起伊犁东北的精河（晶河），向东经库尔喀拉乌苏、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到达甘肃的安西，与嘉峪关以东的台站相接。这是清代用兵西北时所设立的军报线路，连接了清代在北疆主要的军事驻防点，战后得以保留。其作用主要是传递军营文报，每塘设有军塘夫以司接递，都司一人，督率稽查。夫马钱粮归文员奏销。[⑦]而且，在许多地方，防汛、军台之间距离太远，塘与军台相间于道，可补充军台间距太大、呼应不灵的缺陷。[⑧]到新疆改建行省后，这些军塘与军台一起改为驿站。

但除此之外，塘在清代遍布各省，兼有信息传递和防守地方、维护治安的作用。[⑨]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根据军队驻扎需要设置传递军营文报的营塘。为方便调度，各提督、总兵等都在自己的防地内都以塘作为专门的军事信息传递设施，安设塘兵，接递军营文报以及本章等其它公文。[⑩]其设置一般只有五六间房子，牌坊一座，望楼一座，烟墩一座，旗杆一座。[⑪]每遇战事，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它会随军营而设。例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缅甸战事结束，清朝在从缅甸边境至腾越州的路上添置军塘十三处，用于对边境情况的监视。这些军塘由各省军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设和管理，中央没有统一的要求。二是传递邸报的塘。这种主要是指在京城与各省督抚驻地之间的文报传递系统。自顺治时期开始，清朝各省逐渐在北京设立驻京提塘，负责抄录京报、部文，然后传送回本省，以通消息。[⑫]可抄录递送的内容包括章奏事件、敕书印信以及各部院寻常咨行外省的公文等，这在当时被称为邸报。实际上邸报是朝廷将一些政务向全国官员公布的一种方式。邸报的传送方式，各省不一。一般由督抚派拨属下的标兵带马驻守，一遇邸抄部文，星速飞传。由于各省情况不一，这些塘兵的费用开支来源也不尽相同，多由各省自行筹画，中央没有统一的款项。如山东省认为塘兵不在军营不宜再领军饷，所以塘拨经费由传阅塘报的各官署衙门分摊，按季提解藩库，称为“阅报银”。[⑬]而在浙江、福建，塘拨的经费完全来自于该省的恩赏备公银两。在两江总督辖地，塘拨所需饷银出自专门地亩的地租。[⑭]

可见，除了在交通运输、官员接待方面发挥作用外，驿传体系的信息传递功能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传递机要文报，须马上飞递，刻期抵达；二是传递普通文报，时限较缓。之所以作这种划分，是因为晚清驿传体系的转型就是按照这两种功能的不同而产生两个转变方向。机要文报的传递逐渐被近代电报取代，普通文报的传递功能则逐渐为近代邮政承载。

二

导致传统驿传体系近代转化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因素，驿传体系自身的腐化，使其无法满足晚清的军政需求，因此需要变革；二是外部因素，国外新的信息传递理念已经受到晚清有识之士的关注，为驿传体系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在驿传体系运转日渐艰难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中国却对驿传——这种当时唯一的信息传递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势力侵略日亟，边防危机接连出现，通商、谈判等各种新的军政事务，纷至沓来，且

都万分紧急，其繁芜复杂之程度，近代以前从未经历，这对驿传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驿传体系在文报传递的数量、速度等方面都受到了挑战。例如在辽东半岛上，原来由于文报不多，辽南各县没有设置驿站，只有递铺。但到近代，辽东半岛南端旅顺、大连军港的建成，使该地区已经成为清朝海防的一个重心。迟缓的递铺显然无法满足需求。在直隶，这种军政布防的转变更加突出。同治九年(1870) 直隶总督驻扎天津办理洋务、海防事务，天津成为一个军政重心，奉天、吉林各府，山海关、天津等道员，以及分别驻扎在山海关、奉天、吉林等处的练军各部，都要调整原来的驿传路线，将文报送到天津。"皆与北洋大臣衙门，并津海关道、海防营务处、支应局、机器局、制造局、军械所暨各统营官，时有往来文牍，较从前多至十数倍。且悉关防务重要，往往排单飞递，限日行至四五百里，实为向来所无。"⑮但是，当时该地区的驿传建制非常薄弱，如天津宝坻县，一直没有驿站，只备有八匹马传递文报。

而另一方面，进入近代以后，清朝的驿传体系的腐化不断加剧。驿传体系受官员干扰严重，以致于腐败丛生，漏洞百出，滥行驰驿，例外需索。"上官既藉差遣为市惠之端，差员即视台站为生财之薮。"⑯虽疲于应付，仍是不济。所有这些弊端，最终又通过各种手段和名目，转嫁于百姓。"凡有牛驴之家，无不编派，竟有终岁未曾当差，按日勒其纳价，合计一年差费不啻正项钱粮。"⑰这与清初朝廷极力改革驿传制度，以免扰累民间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其结果是驿传体系效能降低，主要表现在驿传文报迟滞、丢失以及被拆看的事情频频发生，其支撑帝国运转的有效性已大打折扣。面对这种情况，清朝统治者忧心忡忡，虽有心整顿，并再三严令申饬，为此甚至不惜将一些地方大员查办。如咸丰十一年（1860)，署直隶总督文煜、按察使吴廷栋、顺天府尹张祥河等都因文报传递失误而被交部严加议处。但驿传体系仍然是积弊难返，不见起色。沈桂芬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倘或照此办理，吾恐杖之不胜杖，而罪之不胜罪矣。掩耳盗铃之举，亦何益哉？"⑱

西方近代电报、邮政等新的信息传递方式的到来引起了时人的关注和思考，并成为一种强大的外力推动了传统驿传体系的变革。

三

自近代以来，西方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这不仅包括船坚炮利的军事技术，也包括电报通讯、邮政等新的信息传递方式，公路、铁路、轮船等近代化交通条件。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铁路、电报、邮政等新的交通、通讯方式与各种军事技术一起，被以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看重并接受，并力图仿效。这些新事物的传入为中国在当时寻求信息传递方式的改进提供了新思路，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已经不允许中国在信息传递方面回到过去。

(一) 驿传体系传递紧要文报的功能逐渐被电报所取代。

1837 年美国人莫尔斯发明了电报机，电报通讯在西方国家迅速发展起来。1851 年英吉利海峡海底电缆铺设成功，这标志着人类的信息传递不再单纯依靠人力，可以跨洲过海，转瞬即达，所受的地理限制已经大大缩小。在当时，电报的应用使西方列强在争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中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成为他们了解商情、军政情报的得力工具，推动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统治体系的进程。随着他们的侵略势力伸向中国，电报也尾随而至。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英国的电报公司已经把水线 (海底电缆) 沿地中海、红海、印度洋铺设到印度，并计划经东南亚、香港向中国沿海延伸。由英国、挪威、丹麦等国组成的大北电报公司，则将电报陆线 (陆地电缆) 横贯俄国的西伯利亚，铺设到中国和日本的国界之旁。他们逐渐通过各种方式攫取中国电报线路的铺设权，大北公司获得了沪港水线的铺设权，并企图染指福州到厦门的陆线，后因清政府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但列强在中国发展电报业的势头并未因此中断，对中国电报主权的觊觎与侵犯也不会停止。而且，外国电报的到来以及它在当时战争、外交中的运用，使中国传统的驿传体系相形见绌，并成为影响国家之间

战略优劣的主要因素，促使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认真地加以考虑。

同时，李鸿章等一些负责南北洋防务的官员在与列强的交战、交往中也深刻感受到电报这种新型通讯方式的效率要大大超过以往的驿传体系，必然会在国家军政要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二日，也就是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奏请设立南北洋电报，他在奏折中详述了电报在传递重要军情中的作用，并阐明了中国发展电报的必要性、可能性，在当时算得上有代表性的观点：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罗斯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同治十三年，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循迄无成就。臣上年曾于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倾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泄露之虑。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19]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等人看到了传统驿传体系根本无法与电报相提并论，对电报在中国防御列强中的作用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而且电报甚至影响着李鸿章等人世界观的改变。在传统的驿传体系下，拓地数千里的清帝国已经足以以“天朝大国”自居，而电报的到来让李鸿章等人认识到，因为有了电报，联系方便，万里之外的西方列强，犹如在中国户庭之侧，近在咫尺。

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朝已经将京沪、长江沿线及广州至龙州的电报线建成，在中法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改变了过去“奏折往返须五十余日”的局面。每念于此，李鸿章总是无比惬意：“适值法人起衅，沿海戒严。将帅入告军谋，朝廷发纵指示，皆得相机立应，无少隔阂……中国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神速者。”[20]清廷对此非常赞赏，督促李鸿章“妥速办理”。于是 18 个月后，自天津沿运河至江南镇江、再转至上海的津沪电报线得以建成。[21]光绪九年（1885），在李鸿章努力下，这条电报线由天津延伸到通州，与北京相接。[22]之后，电报线从天津延伸到山海关，再经营口直达旅顺，这样一条南自上海北经天津至辽东半岛口岸的南北洋防务专线得以建立。这些线路多由清政府自筹款项，不允许商业资本介入，原因就是事关军机要务。

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国的电报线路以上海、北京为基点，迅速向其他省份扩展。在南方，由上海向西进入江浙，逆长江至湖北、湖南、进入四川；又经贵州直达云南极边之地。由上海向南进入福建、广东等地，又开通由广州至龙洲的电报线，直达中越边境。在北方，光绪十三年（1887），清朝开始筹办从南到北贯穿东北地区直达黑龙江的电报线，同时从天津至保定、从济宁至开封电报线路相继建成。1889 年，电报线又由保定向西经太原、西安直达甘肃的兰州、肃州和嘉峪关。光绪十八年（1892）十一日初五，李鸿章上奏筹办建设新疆的电报线路，他说：“新疆自收回伊犁之后，俄人往来络绎，南路喀什噶尔与英属北印度接壤，中隔布鲁特、坎巨提各部落，交涉日繁，应节节预筹，设线通报。”[23]之后，先北疆后南疆，电报线路很快覆盖新疆全境。而且，清朝出资兴建从东北通往朝鲜，以及朝鲜国内的主要电报线。由奉天经凤凰城入朝鲜境，连接义

州、平壤、汉城、仁川，设立四个电报局，归中国电局代管。因为"该国为辽沈屏藩，毗连俄日边境，内患外侮，在在堪虞。中国控制保护，必有电线以通消息，否则机务阻滞，事事尽落人后。"㉔

总之，自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以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清朝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电报线网络。李鸿章对此非常自豪："中国电报，经臣奏明，自光绪六年创始，先从天津、上海设局开办，逐渐推广。十年，将通州电局移设京城，联为一气，自是沿江沿海、边远各省次第接设电线，绵亘至一万数千里。"㉕

电报网络的逐步建成，对于改变传统驿传体系传递军政信息的格局有重大意义。"一切要政朝发夕至，消息灵通。而事务之繁，责成之重，则以京城、天津、上海为转递各省及东西洋各国之枢纽。凡有总理衙门传奉谕旨，以及各省督抚、出使大臣来往官报，无不由此三处传达。当光绪八、九、十等年，法越起衅，沿海戒严；朝鲜两次内乱，派兵援护，将帅军谋，朝廷密谕，在在胥关紧要，不容丝毫延误。上年南省会匪蠢动，私运军火，事机危险，幸有电报立时递达，先期查获，消患未萌。去冬朝阳教匪倡乱，事起仓促，军情急迫，奉直两省征调防营及臣指示各将士剿办机宜，均赖电报迅速，相机立应，早奏肤功。"㉖

李鸿章的奏报不无饰美之辞，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当清朝统治者获得了一种比传统驿传体系更有效率的信息传递方式之后，当军政事务的处理因此变得迅速时，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因此变得更加易于把握时，喜悦之情不禁溢于言表。自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后，清朝外侮日深，但国内一直没有太大的动乱，在一定程度上与以电报为信息传递工具，信息传递迅速，能够闻讯立动，消灭于未萌有很大关系。

然而，电报并不能完全取代驿传体系。一是因为电报费用昂贵，电文必须尽量斟酌，反复压缩，以求简约，对事务的商讨无法展开；二则电报网络的发展尚须时日，清朝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使之粗具规模，但不能到达所有地区，在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电报设置很晚，所以与驿传体系有一个互为补充的并行时期。第三，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清朝对电报虽很倚重，但也一直心存顾忌。如清朝中央曾质问李鸿章某些电文是否曾被人改动过。"上谕：有人奏，该大臣于前敌各军电报，往往改易增损字句，然后入告等语，著据实覆奏。"㉗另外，在许多中央与地方事务的处理上，电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还须依赖驿传。一些官员对此深有体会："在未有电报之先，公家紧急公文，全持驿站递送，故当时视驿传为要政。迨设电报后，遇有紧急要事件，虽可先行电闻，然得电后，仍须俟奏报或咨文到来，始能为据，因电报可作伪也。"㉘这段话说明，当时的驿传仍有存在的必要性，电报对驿传功能的取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西方邮政体制的传入及其影响

世界近代邮政发韧于 18 世纪的德国，之后迅速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及美国兴起。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为保持与国内的通信联系，他们在所居住的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地方，设立邮局，以通信息，这些邮局被称为"客邮"。它们各用本国邮票，各按本国邮政章程从事邮政业务，其邮件也不受中国海关检查，形成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随着列强侵略势力向由东向西逐步推进，"客邮"也由沿海深入中国内地，遍置于新疆、西藏、云南、黑龙江等地。列强在中国发展"客邮"的借口是中国没有邮政机构，但既使中国自 1896 年正式成立国家邮政管辖机构以后，"客邮"数量仍然有增无减。以英国为例，1870 年，它在中国设置邮局的数目为两处，1918 年则为 140 处。后经北洋政府与列强各国反复交涉，才最终清除"客邮"，统一邮权。

外国邮政的进入大大刺激了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一些有识之士，如郑观应、胡燏棻、冯桂芬等极力呼吁借鉴西方邮政经验，建立本国邮政体系，改进中国传统驿传体系这一劳民伤财、步履维艰的信息传递方式，并抵制外国的侵略。郑观应说："西人尝谓中国度支有出入两大款可省而不知省，当取而不知取。可省者即各省每年开支驿站经费几耗天下钱粮十分之一，当取者即设立邮政局，征收其税。令中国若行邮政，则驿站之费似可裁减。"㉙"其法：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设立分局，一切公文信件俱归递送。如此则每岁可省驿站三百

余万之耗费，而收邮部数百万之赢余，一转移间，即见成效，亦何惮而不为哉？”[30]

但作为一种新事务，其发展也受到许多人的反对甚至抵制。光绪二十三年（1897），即开办邮政的第二年，御史徐道焜上奏对邮政弊端予以指责：一是带信之罚太严，二是寄报之费太重。这些与习已为常的民间带信行为严重相悖。同年，两广总督谭钟麟也奏称：由于带信之罚太重，邮政程序琐碎繁苛，以致于“众怨沸腾，无裨饷需，徒伤政体”，请求将邮政局一体裁撤。[31]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朝统治者一部分人在观念上还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西方的近代邮政。在西方人看来，所谓国家邮政是由国家以信誉保证来办理，依托民间，获取巨大财政效益的事务，同时实行国家垄断，排斥其他组织和个人捎带信件的行为。但在中国人，尤其是统治者的意识中，国家通讯与民间通信应该截然分开，完全不同。驿传体系是一种国家通信，只承担政府文报传递；而民间通信在清代及清代以前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民信局承担，完全是民间事务，国家不予过问。而西方的邮政则以办理民间通信为依托，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这是一种与民争利的举措，不屑于为之；况且，邮政能否有效地承担起政府文报传递的功能也是值得怀疑的事情，所以清政府对办理邮政的态度自然非常不明朗。

作为对当时中国邮政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总税务司赫德，对清朝在这一方面的心态也深有体悟：“远在1861年6月间我初次到北京时，已经提出照西方办法办理邮政。但是，由于京城和各省当局意见不一致，有关大员随时更动，同一大员的意见也随时变更，推延到现在，难以进行。”[32]“中国官方不愿意同各地以带信为生的人民争利，不愿意对各国承担还无力承担的责任，这些都是正确的，但也因此影响了提出开办邮政的意见，并且把开办的决定推迟了。”[33]

在客观上，近代交通发展缓慢，无法为邮政提供足够的支持，也是制约近代邮政的重要因素。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铁路、公路、航运虽然已有所发展，但要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形成欧美国家那样近代化的交通体系，显然尚须较长的时日。这对邮政来说必将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主办中国邮政的总税务司赫德说：“邮政虽有政府的全力支持，但在缺乏像其他各国所有的优越条件如好的公路和妥速的交通的情况下，无论从便利公众或收入来源说，即使要求不高，也不一定能令人满意的。”[34]

这些争论以及近代邮政意识的淡薄，使清政府一直犹豫不决，拿不出确定的政策，以致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专门管理邮政的官方机构，没有承担起国家邮政主办者的角色。加上客观条件的制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有办理邮政之议，在以后三十多年的时间中，邮政只能以海关兼办、地方试办等各种方式比较缓慢的发展。

（三）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过程

1、地方试点。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从事实际政务的封疆大吏那里，已经开始摸索着试用一些新的交通工具，如轮船等来传递文报，与原来的驿递参酌使用。例如，李鸿章就经常把一些寻常文报发交轮船分别投递，通常比五百里驿递还要快一些。[35]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在天津、北京、烟台、牛庄、上海五处，效仿西方，试办邮政。他在这些地方开设邮局，并委托总税务司赫德管理。

2、海关邮局。海关代管邮局是中国建立近代邮政过程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北京条约》签定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成立，专门负责涉外事务。驻京各国使馆的文报由总理衙门收转代寄，一般都交驿传体系驰送。但由于战乱频仍，驿传疲敝，总理衙门担心中国的驿传体系无法“保安照料”各国往来文报。1865年，总税务司成立，总理衙门立刻委托总税务司代为管理邮政事务。所以自1866年起，北京、上海、镇江、天津海关先后成立邮务办事处。第二年，海关又将邮政通信的收费标准和发送邮件的时间表公布，主要递送外国使馆文件和海关信件。这样，中国海关凭借其特殊地位，从弥补驿传功能缺陷入手，介入邮政，并逐渐扩大经营范围。1878年，李鸿章开办的五处邮政，也交由海关管理，使海关办邮获得官方更多的支持，并大大扩展了业务范围。海关办理邮政已完全脱离了

中国原有驿传体系，在水上，它基本上依靠海轮或内河轮船；在陆上，则大批招募专门邮差，开拓邮路，并经常派人沿途巡视。同时，海关又于 1878 年发行邮票，面值有三分、五分、一分三种，分发给各地使用。海关邮政发展比较迅速，到 1896 年，全国 24 处设有海关的地方都基本上开办了海关邮局。[36]

海关试办邮政，仍以传递官方文报为主。它是适应外国人的要求产生的，而委托海关管理邮政，实际上就是委托给赫德、德璀琳等这些精通西方邮政体制的外员来办理。然而它毕竟是按西方邮政的指导思想来运行的，为中国国家办理邮政提供了直接的经验。从 1878 年至 1896 年的八年时间中，海关邮政迅速发展，极大促进了中国人对改造传统驿传体系、建立近代邮政体制的进程。

3、设立文报局。为解决日渐频繁的使臣出洋、奏报困难等问题，清朝在光绪二年（1876）曾设文报局，专门负责出使大臣和驻外机构文报的转递。在上海设立南洋出使文报总局，在天津设立北洋文报总局，作为京沪转口的枢纽，并在北京设立京局。文报局自成系统，最初由总理衙门管理，不负责传递国内各衙门间的公文及民间私人函件。但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其领导权逐渐分散于各地的督抚，其业务遂由沿海辐射至内陆各地。文报局的功能逐渐扩大，官府各种公文基本都交付文报局传递。如江南省，在北京裁撤原有的驻京提塘，改设江南文报局，部分重要文报仍由驿站传送外，其它文报均交文报局接收，随到随发。[37]

4、台湾的探索。受外国邮政的影响，某些地方开始探索在自行办理邮政事务的路子上迈出步伐。台湾向来不设驿站，岛内公文由铺传递，与大陆文报往来则由船渡海，再由福建循驿站递送入京。1886 年，台湾建省，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办铁路、开矿产的同时，也开始着眼于对传统铺递系统的改造。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刘铭传以铺传为基础构架，建立邮政体系。在台北设立邮政局，负责全岛邮政事务管理。以原设的各站铺为邮站，自台北至台南定为邮路干线，邮站有正站、腰站之分。除传递官府公文外，也递民间书信。邮票有两种，官用者盖印“台湾邮票”四字，民用者盖印“台湾商用”字样，票上皆有发送时日空格，备发送者自行填写。票价视信件轻重、地方远近而定。站兵即为邮差，徒步递邮邮件，每日二回，在各站交换。[38]站兵行差每个时辰必须行十九华里，不得耽搁。台湾还专门备有两艘邮轮，名叫“南通”和“飞捷”，定期往来于台湾与上海、福建之间，递送邮件。[39]

台湾在办理邮政上的这种探索可看作是传统驿传体系向近代邮政体制的过渡，是中国人借鉴西方邮政体制之经验，自行改造驿传体系的探索。这种尝试本身保留了诸多驿传体系痕迹，但也正是这种保留说明传统驿传体系与近代邮政体系之间存在联系。后来中国国家邮政体制的建立，恰恰就是在以往驿传构架的基本上发展而来的：站改为邮局，驿传线路改为邮政路线，旧有的站差改为邮差，这也是中国国家邮政体制建立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5、国家官办邮政的实行与发展。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在总理衙门“具奏议办邮政，请由现设邮递推广，并与各国联合”的奏折上批示：“依议。”[40]从此清政府开始把邮政作为国家事务来办理。清朝虽于 1896 年开始由国家出面办理邮政，但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管理的机构，全国邮政局事务仍然是由总税务司负责。同时，驿传体系仍掌握在兵部手中，裁驿设邮的过程中事权不一。直到 1906 年，清朝实行立宪改革，才有了正式的官方机构。中央设邮传部，负责铁路、公路、轮船、邮政四项事务的管理；驿传事务则由兵部划归陆军部。这样，新成立的邮传部从总税务司接管邮政，从陆军部接管驿传事务。

清朝最为关注的是新的邮政系统能否承担起以往驿传体系传递政府机要文报的职责。在批准推广邮政的同时，清朝中央又授意总理衙门就此问题向赫德提出质询：一是如何设法推广邮政，二是如何裁驿站以归邮政。赫德对此保持低调，他认为由于财政、交通等方面的限制，邮政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须宽以时日，“先于各口已设邮局之就近地方密为布置，步步前进以达于内地……凡铁路设站、电报设局之各处，均添设邮政官局。”[41]他也不主张立

刻将驿站全部裁撤,“至裁撤驿站归并邮政一节,其事关系递送公文并办理国家之事,是以尤为紧要,断不能轻举妄动。”[42]他认为至少要有一年的实验期让邮与驿并行,在此期间,政府公文正本由邮政局发送,副本则由驿站照旧寄送,以防遗失。一年之后,如果邮局运转既妥且速,再决定如何裁减驿站。赫德还具体开列了中央与已设邮政局各省之间公文传递的具体方式以及时限。以直隶为例,京城公文交台基厂邮政局,一日传至天津;天津公文交紫竹林邮局,一日可抵京城。

赫德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地方各省裁撤驿站归并邮政的进程因条件之差异而各不相同,“驿站由渐裁撤,邮政由渐加增”是对这一过程的准确描述。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朝在京城设文报总局,各省省会设分局。二十六年(1900),京汉铁路开通,河南、山东等省也建立文报局以通邮政。到此时,除了西北的陕、甘、新等省外,其余各省都已有了邮政网络的覆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近代邮政较诸以往的驿传体系有很多优势。1901年,在准备发展邮政的山西,巡抚的告示是这样说的:“今立邮局,则重洋绝域,无异乡邻,往复要函,克日即达。专差可省,译费可轻,此其便于民者也。”[43]到1908年,邮政事务转归邮传部管理以前,全国各地已设邮局三千二百余处,每年邮件数目在二百兆左右,收入为一百三四十万两,支出为一百六七十万两。[44]也就是说国家每年需要贴补给邮政三四十万两白银,与用三百万两支撑驿传体系相比,负担大大减轻。

近代电报、邮政事业在逐步取代传统驿传体系的过程中,也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在驿传体系下,清朝曾开疆辟土,拓展边地,但也仅局限于中国内部的发展,在以人力、畜力为主要方式的信息传递体系下,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联系非常困难。康熙时期,雅克萨之战胜利后,飞驰十一日告捷已属迅速;索额图赴俄谈判,信差往返,数月才有音讯。而自近代后,无论由电报还是邮政,都已与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传递体系接轨。就电报而言,中国电报网络建立的同时,又北与沙俄报线相接,南与在越南的法国报线相衔。甲午战后,李鸿章周游欧美各国,其间谈判不断,但由于电报通讯手段的支持,他与朝廷就谈判内容随时进行磋商,倒也从容。就邮政而言,中国在办理国家邮政后,光绪三十年(1904),与法国、英国分别签订邮件互寄章程;三十一年(1905),又与德国议订互寄邮件暂行章程。[45]在此基础上,中国也开始在邮政领域与西方各国对话。这主要表现在清朝两次派员参加万国邮政联盟的活动。1874年9月15日,世界22个国家的邮政代表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签订《伯尔尼邮政公约》,是为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之始,其宗旨就是要便于各国邮政体系间的邮件互换。1897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第五次邮联大会;1906年在意大利的罗马举行第六次邮联大会,中国均派代表列席了会议,并希望加入邮联。尤其在罗马会议上,中国邮政发展的成绩令与会代表大为赞叹。虽未入会,但中国能否加入世界邮联的问题已经被提上日程,为1914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办的第七届邮联会议上加入邮联奠定了基础。[46]

总之,晚清信息传递方式的近代化是一个多向发展的过程,是由传统的驿传体系向近代电报、邮政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不但改进了清朝在国内的诸多事务的处理方式,而且扩展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深了与其他国家的沟通,有利于走出以往驿传体系支撑下的天朝大国走向世界。

①《郑观应集》,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7页。

②(光绪朝)《清会典》卷51。

③这里的省级官员应该包括,各省督抚藩臬、提、镇以及重要道员和各地的驻防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

④“雍正九年议准:文武各官来往公文,有事关军机及紧要刻难迟缓者,一面由马上飞递,一面将飞递缘由知会驿传道备案。”见(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702。

⑤(光绪朝)《清会典》卷51。又如:“奉天将军及五部、府尹有紧要公文,交盛京兵部由驿递送。寻常咨行在京部院及咨行各省公文,归并直隶提塘办理,由通州知州发铺司,交提塘查明分送。至在京部院发往奉天各衙门紧要公文,由部交驿递送;寻常公文,均交直隶提塘,由通州知州发铺司,即送到奉天所属地方,交马快即送。”

⑥“驻京提塘十六人,掌递部院官文书,送敕印以达于

本官。’见于(光绪朝)《清会典》卷 51。
⑦(光绪朝)《清会典》卷 51。
⑧如,乾隆四十七年陕甘总督李侍尧奏报:“乌鲁木齐提督所属自迪化州起至哈密所属星星峡止,绵亘二千余里,多属戈壁,安墩汛二十五处,相距百余里、七八十里不等,途长站大,汛兵不能兼顾,应将原设塘拨照旧存留。”见《清高宗实录》卷 161。
⑨王槐荣修,许实纂《宜良县志 ·建置志》卷 3,民国十年铅印本。“重门击柝大易,所以甚其防,司险掌疆,周官所以达其节,汛塘哨铺之制,所以诘奸宄而戒不虞也。”
⑩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十九日署理两江总督萨载奏称:“缘江南各标计八十二营内,或道路迂阔,与文职并不同城,或僻处山陬,或孤悬海外,一切公文不得不设立塘兵专司走递,以期无误公事。”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44 辑。
⑪王槐荣修,许实纂《宜良县志 ·建置志》卷 3,民国十年铅印本。
⑫“凡题奏奉差之事,下科后,令该省提塘赴科抄录,封发各将军督抚提镇。’见(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 703。
⑬《山东巡抚塞楞额奏请将原拨塘兵尽行裁撤归营伍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1 册。
⑭“查出江宁、宿松等州县共三十六处城乡隙地,令民搭棚居住,升纳租银,每年共应输银七百三十两,其余不敷,系江南、江西司道府州县公捐解给。”《史语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见仇润喜主编《中国邮驿史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⑮⑯⑱《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375,刘锦藻撰,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
⑰(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 696。
⑲《请设南北洋电报片》,《李鸿章全集 ·奏稿》第三册,卷 38,海南出版社。
⑳《创办电报请奖折》,《李鸿章全集 ·奏稿》第三册,卷 54。
㉑《创办电线报销折》,《李鸿章全集 ·奏稿》第三册,卷 44。
㉒《展接津通电线折》,《李鸿章全集 ·奏稿》第三册,卷 46。
㉓《拟设新疆电线折》,《李鸿章全集 ·奏稿》第四册,卷 75。
㉔《筹拨朝鲜电报经费折》,《李鸿章全集 ·奏稿》第三册,卷 62。
㉕㉖《京沪电报请奖折》,《李鸿章全集 ·奏稿》第四册,卷 74。
㉗《汇覆铁路电报等事折》,《李鸿章全集 ·奏稿》第四册,卷 79。
㉘周询《蜀海丛谈》,卷一,巴蜀书社 1986 年版,第 42 页。
㉙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第 67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㉚㉛《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377。
㉜《1896 年 4 月 9 日总税务司赫德通令第 706 号》,《中国海关与邮政》,第 78 页。
㉝㉞《1896 年 4 月 30 日税务司赫德通令第 709 号》,《中国海关与邮政》,第 78 页。
㉟《夹板印封仍由驿递片》,见《李鸿章全集 ·奏稿》第二册,卷 23。
㊱㊴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第 20 - 22 页,人民邮电出版社 1984 年版。
㊲《陆军部为裁撤江南驻京提塘改设文报局事奏折》,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见《历史档案》1999 年第 2 期。
㊳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第 702 页,中华书局 1941 年版。
㊵《1896 年 4 月 9 日赫德致总理衙门申呈京字第 3051 号》,《中国海关与邮政》,第 77 页。
㊶㊷《1898 年 11 月 14 日赫德致总理衙门申呈京字第 3626 号》,《中国海关与邮政》,第 91 页。
㊸《山西巡抚保护邮政的告示(1901)》,见《中国海关与邮政》第 96 页。
㊹《1908 年 12 月 31 日署总税务司裴式楷致税务处申呈关字第 813 号》,见《中国海关与邮政》第 185 页。
㊺《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377。
㊻丁进军《清末中国参加第六次万国邮联活动始末》,载《邮政文史》1997 年第 2 期。